

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研究

吴向伟, 张 晗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构想:“既反帝又反军阀”,扫除“这二重障碍”,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民众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之实行”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成立一个坚固的精密的组织”,即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这些构想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篇章。

关键词:李大钊;民族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5-0001-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5.001

Study on Li Dazhao'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U Xiang-wei, ZHANG Ha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ies, Li Dazhao proposed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realizing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Both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warlords", eliminating "these two obstacles"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People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structur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so "most people of the society must be relied on" to achieve the rejuvenation. Socialism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ism"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Establishing a strong and precise organization", which means establishing a strong proletarian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se conceptions have shown the Chinese people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erved as the first chapter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Li Dazhao;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Marxism; CPC; socialism

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是李大钊。1916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1]332}1917年4月,他又在《大亚细亚主义》

中说:“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2]155}1918年6—7月,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KS151)

作者简介:吴向伟(1967—),男,湖北大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2]313}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后,李大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实际,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构想,并为实现这一构想不遗余力,贡献了毕生精力。

一、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近 80 年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先进的中国人拿起过各种思想武器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封建主义思想,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都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848 年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后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最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1918 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在李大钊的培育和影响下,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919 年 7 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说:“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其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针对胡适的这种观点,李大钊于 1919 年 8 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3]49}。“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

的。”^{[3]50}具体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的指导。1919 年 9 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绝不能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3]23},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3]23}。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51}人们在运用一种理论指导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3]51}。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陈独秀也曾指出,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李达认为,无产阶级怎样进行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书本没有具体答案,要“按照中国国情”来决定。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通过写文章、演讲和授课等途径,满腔热忱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创办学会和革命团体培养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造就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英;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通过创办刊物、补习学校等方式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这些活动,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发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另一方面,李大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及革命的前途等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飞跃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时

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的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切实坚持由李大钊同志初步提示,其后由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系统而深刻地加以阐明和完善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2]459}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抚今追昔,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今天,我们更深刻感悟到在近100年前,李大钊举起的旗帜、初步提示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二、“中国民族运动应该既反帝又反军阀”,扫除“这二重障碍”,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

近代以后,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只有推翻腐朽的社会制度,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创造前提,开辟道路。

针对帝国主义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活动,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指出,仅仅痛恨卖国贼和视日本人为仇敌是不够的,“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2]459}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11月,李大钊深刻总结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经验,确信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战胜的。他指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阔,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

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它必可摧拉。”^{[3]99}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他指出:“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4]517}

李大钊还深刻揭示了封建军阀对中国的祸害,他指出:“军阀盘踞在各省,各省的财权、政权悉归于他们的掌握。他们登用一般趋炎附势藉公肥私的官僚,豢养一群毫无纪律的土匪式的兵士。他们为保存他们的势力和他们的一大群寄生阶级,遂迫而横征暴敛。他们因军队太多,一省地盘不足,遂迫而侵略邻省。于是教育经费被挪移了,实业经费被侵吞了,将各种为公共事业而用的财源都集中于养赡游民和争夺地盘之用。战争的荼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横行,将中国的工商业摧残殆尽,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5]512-513}

可见,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根本障碍,“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障碍”^{[5]513-514},中华民族复兴才有希望。而这两重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反帝与反封建既相区别,又互相统一。“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5]1},而且,“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本身”^{[5]515}。大约一年后,陈独秀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6]301}。李达指出,“搅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7]192},因此,“排除外力,打倒军阀,这几乎是天经地义了”^{[7]217}。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腐朽的社会制度,才能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前提。

由于内外敌人强大而残暴,李大钊认为反帝反军阀决不能走改良的道路,只能革命的手

段。他指出：“鉴于中国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渐灭殆尽了。我们不能忍了，是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都应该不能再忍了，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啊！”^{[5]515}封建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在中国实行军阀专制统治，“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5]515}。1922年双十节期间，李大钊明确指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实行“暴力革命”，唯有“革命”是救中国的方法。

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李大钊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4]104-105}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5]301}1915年，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16年，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成为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的斗士。1919年他参入领导了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1922—1924年他积极推进国共合作，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起来，1925—1926年，李大钊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下令通缉。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李大钊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奉献了全部精力乃至生命！

三、“民众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

1914年11月，李大钊指出：“今有存者，惟

此新势力耳。新势力维何？即群众势力。”^{[1]188}但李大钊早期曾幻想借助以袁世凯及其后来的北洋军阀为代表的特殊势力，后来又提出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应“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2]176}。这表明，李大钊早期关于群众的概念停留在抽象的、精神思辨层面。通过对十月革命的考察，他认识到“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做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就是庶民的胜利^{[2]358}。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提出了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主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真正的解放》等文章指出“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加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改造社会的基础实力”“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2]481}。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3]20}“无论何人，应该认识到民众势力伟大……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3]262}

在当时的中国，民众是谁呢？李大钊指出：“反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4]209}他们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唤醒、引导和组织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22年6月1日，李大钊等提出了《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指出：“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5]515}11月7日，李大钊又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我们劳苦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4]124}。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

在国际资本主义和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是可能。”^{[6]370}

李大钊还深刻分析了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地位及其作用。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科学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鼓舞和“二七”惨案的教训,李大钊认识到工人阶级具有最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他指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5]51}“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4]512}“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4]226}李大钊认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国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5]98}“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5]107-108}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3]221}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应该“扶助他们”“帮助他们”。在世界范围上看,国际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我们的仇敌,而受他们压迫的工农群众,都是我们的朋友。

基于上述认识,李大钊阐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统战思想:“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5]298}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从1922年8月到1924年2月曾“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22年8月,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去杭州参加中共中央执委会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的特别会议。同年9月,李大钊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

四、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之实行”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李大钊投身实现民族复兴事业,最初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李大钊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2]316}。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367}。这表明,他已经信服十月革命所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

针对张东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攻击谈社会主义是“不顾国情”,中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只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调,李大钊反驳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4]408}社会主义的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2]367}。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李大钊概括了社会主义的定义,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质和一般特征,即将其从精神方面分为“智、情、意”三项;从社会方面分为“政治、法律、经济”三项。他指出:“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包含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照

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4]245}

李大钊从阐释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对“误解社会主义为社会学”“误解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为一物”“误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一义”“实行社会主义决不发生竞争”“社会主义是无家庭者”“个人自由在社会主义下会受到束缚”“社会主义是破坏生产者”“社会主义是不道德者”等种种误解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针对一些人提出的社会主义虽然平均但却贫穷的观点,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4]458}针对社会主义不发生竞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竞争,但与资本主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盖社会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今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不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不过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4]246}由此,社会主义国家“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建立新的竞争秩序,以保证“协作的生产”和“真正平均的分配”得以进行。

社会主义不仅是实现民族解放之路,也是实现国家富强之路。针对张东荪等提出的振兴实业必须依靠资本主义的观点,李大钊文驳斥道:“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3]353}他结合苏俄高效发展铁路等实业的事实,指出:“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3]353}振兴实业,需要资本和劳力,中国现在基本具备这两个条件,只是社会制度腐败,没能合理利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缺乏劳力。”^{[3]354}他指出:“所以

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360}李达也指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7]65}李大钊提出“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354}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4]457}。

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4]165}作为第一阶段,“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4]165}。政权的夺取是前提,是必经的第一阶段。而“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4]165}。根据苏俄的经验,他完全赞同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者的社会和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间,有一个由此入彼的革命的过渡时代。适应乎此,亦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4]165}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4]168}。无产阶级应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将铁路、矿山、银行等大资本的企业收归国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上的“自决”“自主”“自立”。

李大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并没有规定的模式,必然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此,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俄……有异”^{[4]248}。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有自己的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主义诞生 2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李大钊从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描绘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蓝图,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辛亥革命后,政党祸国论比较流行。李大钊虽然对当时的国民党和进步党不太满意,但不反对政党的存在。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1]1917年4月,李大钊撰写了《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一文,对欧洲各国的社会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在十月革命前,他不可能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任务。

俄国的十月的炮声,惊醒了正在寻找中国出路的李大钊,他热情宣传十月革命,也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表示极大的关注。他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2]³²⁹李大钊由此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李大钊放眼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1921年3月,他指出:“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3]³⁴⁸李达也指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

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7]¹³³据此,李大钊最早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任务,他说:“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的团体。”^[3]³⁵⁰陈独秀也提出,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6]⁵⁷。

虽然,“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 Communism 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3]³⁵⁰。李大钊向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明确发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号召,他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3]³⁵⁰

李大钊深刻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他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2]³⁶⁴在李大钊看来,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在中国必须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为了推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李大钊通过指导和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少年中国学会、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社团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等骨干力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先进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开展工作,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积极投身党的创建工作。一方面与布尔特曼、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维金斯基等第三国际使者接洽;另一方面与陈独秀商讨建党计划,此即“南陈北李、相约建

党”,并根据计划在北京直接指导和筹划创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组织准备。

1921年,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8]经过长期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综上所述,李大钊初步提出了关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构想: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探索和设想,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路、实现民族复兴的经验教训,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篇章^[9]。

参考文献:

[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7] 《李达文集》编写组. 李达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

[9] 宋镜明,吴向伟,李文珊,等.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

(责任编辑:李亚平)